

六十年来难忘的岁月

○高子伟（1953电机）



高子伟学长

今年是我们毕业60周年的大庆吉日，我提笔撰文以表达对同学们的思念，怀念我们60年来的难忘岁月。

我们1950年到清华，1953年毕业。三年间好似《西游记》中三藏的跟随，取得了真经和“神号”——“清华毕业生”，并将我一生的思想行为皆规范于其中。

毕业后的60年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：清华阶段、离校阶段、余热阶段。

清华阶段

从1953年到1976年离开清华共23年，这是我经历的“而立”和“不惑”的阶段。先说1953到1966的前13年吧。

1953年刚毕业时，记得给我的任务是“送人”。就是帮分配到外地的同学买票、打行李、送别。当大多数同学告别后，才感形单影孤。今日我送人，明日谁送我？问到电机系的杨秉寿老师，才知要我

留校，到电机教研组报到。

话说当年电机教研组，是个教授云集、人才济济的地方。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坐镇，教研部主任艾维超教授带队；范崇武教授、陈克元教授讲主课；陈汤铭讲师、朱成功讲师、周汝璜讲师分别担当教学、实验的关键环节。系秘书兼党总支书记的杨秉寿返回教研组讲课。我和陈丕璋分到教研组后，陈丕璋是党小组长兼教研组秘书，大家都忙于“全盘学苏”。我是排名最后的小兵，也是团小组长、工会小组长、《新清华》通讯员、班主任、助教等等，职务满身。

一年后，我补作了毕业设计，由章名涛教授亲自指导。我不敢怠慢，光设计报告就有200多页。其中专题由陈克元教授指导，也写了好几十页，成为电机专业毕业设计中最厚的一本，也是多年校庆展览的排头本，很感惶恐，也深谢老师。

两年后，杨秉寿要去苏联留学，让我接替他的课，使我紧张不堪。幸好艾维超教授亲自辅导我，从备课写讲稿到试讲，都手把手教。他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严格的要求，至今难忘。例如教我：“物理概念要讲透”；“难点要慢，慢才能懂、懂才是快”；“重点要重复，不厌其烦才能深刻，一生难忘”。甚至黑板上书写的标题大小有别；主图和公式的位置要贯堂表示；简明结论的交代要有主次；讲课要像艺术

一样对待。当在一个上百座位的大教室中，艾老师一个人坐着听我试讲，耳提面命，回想起来不禁感激得想哭。1955年高景德留苏回国后，任科研处处长，但坚持在教研组开课，并开展科研，并要我当科研助手。他计划建立动态模拟实验室也就是电力系统的物理模拟实验室，要我设计、加工模拟电机、模拟变压器。他指导我收集资料，查阅文献，设计、加工样机测试并分析结果，最后写出论文等。这一整套科学研究程序和他那有条不紊的思路和方法，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科研征途，我毕生难忘，至今感怀在心。

回看毕业后的前十年，在多位清华老教授的教导下，逐步走上“而立”的境界，应该说我是幸运的，是时代给了我机遇，为我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。

这十年中，也有些难忘的趣事，不妨一记。一件是我当上了电机系工会的文艺委员。说实话，我唱歌走调，五音不全，如何搞文艺呢？但当年周末常有舞会，我就是放唱片的委员。有时还请来清华管弦乐队助兴；《步步高》、《金蛇狂舞》等歌曲最受欢迎；苏联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印尼的《星星索》等歌曲，至今我还能哼哼几句，都是那个岁月的美丽痕迹。

另一件是我1955年被任命为电机实验室主任。这个实验室在当时是电机系最大的实验室，面积几百平米，仪表设备多达数百件（套），为本系和外系开二十多个电机实验，管理、教辅和后勤有十多个人。我当时才23岁，惶恐之极。幸好在1954和1955年教研组新增七位年轻教师：周明宝（1954）、陈福康（1954）、李发海（1955）、郑逢时（1955）、刘子楨（1955）、

张奋之（1955）、徐伯雄（1955）。大家共写了二十多个电机实验指导书，编写了电机习题集，开出了全部教学大纲要求的实验。回想起来，还是心有余悸。

还有就是毕业后头十年让我成了“高老五”。我不明白为何对我稍有亲近的女同胞，从问我家在哪里后，就像避瘟疫一样逃之夭夭！原来我在台湾的父母给我贴上了“海外关系”这个社会烙印。在当年，这是一个相当麻烦而又恐怖的符号。我幼稚无知还无畏，竟然罔顾身份幻想浪漫，好傻呀！

还要说两件事。一件是徐伯雄在一个班上当政治辅导员，我当班主任。他管政治，我管教学，相好如兄弟。不幸1957年他一夜之间成了“右派”，吓得我要命。我们曾一道带班去哈尔滨电机厂实习，一道在松花江畔赏风景，无话不谈。若他揭发我将如何？后来知道领导要他交待班上的右派学生，但他不从。为保护学生而牺牲自己，是伟大、正直的人。就这样几十年来，我们一直保持友谊至今。

另一件事是钱家骊的事。他当时是电器教研组秘书，我当电机教研组秘书。电器与电机是双胞胎专业，我们一同修订教学大纲，安排课程，要好得很。也是一夜之间他被打成“新富农”，我想我也离“新富农”不远了，吓个半死。其实他很讲理，很有独立思维精神，却被扣上一个“忘本”大帽子。我始终不服，为他鸣不平。我们友谊长久，共当“老五”多年。

接下来的1963—1966年，是我觉悟到又专又红之路与我无缘，白专道路是不走也得走的路。1963年，看来领导并不在意我的海外关系，我当上了在职研究生，

□ 值年园地

导师是高景德教授。于是日勤夜熬，坠入学海。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稿，可惜在“文革”中，遗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毕业后头十年，是我在恩师指导下踏实成长的十年，是我快乐少忧的十年，也是有惊无险的十年。

“文革”十年，与其他同学相比，可能我更糟：六神无主，不知所措；跟着口号走，越来越难走；躲进小家混日月，不知春与秋。

我在工作组驻校期间，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后来又一阵风吹。我还曾被当作“516”，后来又无影无踪豁免光。后来叫我去教工农兵学员，先教正负数后教代数。我以我心教学员，学员也待我如亲人。

“文革”十年我三十几岁，这是我心智成熟期，也是我的“不惑”期。

离开清华

“文革”一结束，我决定离开清华。我是教研组第一个逃兵，逃到了宁夏银川，开始了新的18年历程直到退休。

我来到宁夏工业研究所。这是宁夏最大的研究所，有500多人，老工程师十多个，多系国宝级人物，由于种种原因扣上“帽子”，发配塞上。到达工程师级别少说也有上百位，他们多是才华横溢，心怀大志，但又无缘补天，只好发配于“唯富一套”的塞上江南。再有数百名年轻学子和专业技工和管理精英，这个工研所应说是一颗塞上明珠。

我初来乍到，不明就里，就要我当副所长，可是又不设正所长，我于是又慌起来。这时我的心态可以用兢兢业业、如履薄冰来概括。

我一年要组织管理二十多个科研项目，其中约三分之一完成鉴定、评奖；三分之一结转，继续研究；也有三分之一失败、结束，是宁夏科研成果最多的研究所。我的清华基因教我不离专业，于是在忙碌之余也能不断完成科研项目。先后得奖的有“低噪声电机”、“洗衣机电机(系列)”、“冰箱压缩机电机”、“吸尘器电机”等。红本本奖状积满了一书箱，这为我南下深圳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条件。

值得一提的几件事：一是我入党了。那是1985年胡耀邦落实政策时，对我们这样经历的人给出的关怀和信任，时年已53岁了。二是1982年我与在台湾的父母在香港见面，那是台海两岸解禁的时代。从1948年离别到重聚，整整34年。父母已是满头花发，我也由16岁的孩子，长成五十岁的知天命老牛。三是我的孩子高远，1983年考回清华，1988年考上美国研究生。这是我当时最大的安慰和希望。

1987年底，我和太太到香港会见父母路过深圳，她爱上了这个新兴城市的清洁、美丽、朝气、人和，我们决定到深圳来。1988年打工，是个冒险之年。历经无业、无房、无户口、无前景的惶然，而后又是一一化解的开心。1989年趁市里开会，请朋友带上我宁夏的“红本本”，直找市委书记李灏求调。当即由副书记秦文俊批准，18天后调入深圳。这也应是“深圳速度”吧。

深圳是个创业宝地。在此我申请到一个专利——无刷电机光电传感器，由此开张了一个公司，当上了总经理，真似天方夜谭。公司事业正蒸蒸日上时，1993年我的退休年龄到了，这时心中有些凄凄惨

惨。还有一件事，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当上了罗湖区第一届党代会代表，当时组织动员我到行政部门当公务员，做干部。可我依恋电机专业，想搞技术，不想当官，于是留在了企业。后来才知道企业退休待遇远远低于公务员。不过我对拒官从科技，至今不悔。

发挥余热

我刚退休就有人来找，要办个名曰“龙德”的电机企业。一位年轻牙医援藏一年回深圳，说不爱牙齿爱电机，要我支援。我感动、我兴奋、毅然响应。开始时公司数百人日夜忙碌，业绩蒸蒸日上。不料董事长一夜失踪，卷款逃走，公司堕入冰河。我奔走呼号，还是无用。最后公司减缩到只剩寥寥数人。然而几经风雨，顽强拼搏，二十年后，又是一条“好汉”，公司恢复得比当初更兴旺。

1996年我去星通公司开发无刷电机，后来，又到东莞石碣镇，帮一民企建宇鸿电机公司。年届七十时全退，于是回到上海。

毕业五十周年感怀

李星禄（1963 无线电）

五七相聚清华园，同窗共读整六年；
毕业分配奔四方，工作惜别在六三。
岁月悠悠路漫漫，历尽沧桑苦与甜；
功名利禄俱往矣，欣逢盛世今团圆。
看戏合影大会聚，有幸相逢总是缘；
又见银发青丝减，笑声依旧手相牵。
千言万语说不尽，半个世纪不为短；
匆匆此生人易老，故友远去何日还？
校庆聚会年年有，五十周年不一般；
岁岁相约人渐少，此地一别再聚难。
光阴易逝急似箭，珍爱夕阳未为晚；
与世无争献余热，快乐度过每一天。
老骥伏枥任重远，家国和谐人康健；
祝愿大家皆长久，有情千里共婵娟。
日新月异与时进，母校旧貌添新颜；
努力共筑中国梦，喜看来者竞争先。

生平记述

○刘梦虎（1963 建筑）

我出生之时，正处在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个年头，我的童年就在这场战乱中度过。我6岁上小学，小学时期学习好，总是全班第一名。记得有一年，校董会（私立小学）还特别奖给我

100斤大米。中学时期，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求学生涯。为了赚取酬劳补贴学费，小小年纪，什么活都干过，每年寒暑假还要去山上的打石场打石渣，稚嫩的双手长满了老茧，瘦弱的身躯显得格外单薄。即使这样辛苦地劳作，我学习仍十分用功，保持着全班第一名。上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1956年的全国高考时，成为江山中学自1938年建校以来，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。